

中國文化
名人書系

谈友情

最让你感动的名家散文

人生中不可不读的名家经典



夫 志摩在回忆中
秋 方令孺其人
书 谈交友
远 田家英的悲剧
棋 林斤澜 哈哈哈哈哈……
玲 我和雪峰
季羨林 记周培源先生
艾 青 思念胡风和田间

大众文艺出版社

谈友情

最让你感动的名家散文

人生中不可不读的名家经典



郁达夫 志摩在回忆中
梁实秋 方令孺其人
钱钟书 谈交友
于光远 田家英的悲剧
汪曾祺 林斤澜！哈哈哈哈哈……
丁玲 我和雪峰
季羡林 记周培源先生
艾青 思念胡风和田间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化名人谈友情/邓九平主编.—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0.10 (2010.1 修订版)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ISBN 978-7-80094-891-6

I. 中… II. 邓… III. ①同伴关系 ②人间交往 IV. I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8352 号

书 名: 谈友情

责任编辑: 钟 艺

策 划: 穆建明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印 刷: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9.80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目 录

忆韦素园	1
忆刘半农君	4
追忆中山先生	5
蔡子民先生与我	7
我所认识的高梦旦先生	16
.....	16
.....	21
追悼志摩	21
郁达夫与徐志摩	26
我的朋友郭人麟和甄元熙	28
忆熊十力先生	29
补记熊十力	30
忆守常	32
悼念王少卿	35
志摩在回忆中	38
雕刻家刘开渠	41

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	43
志摩是人人的朋友	48
悼玮德	49
傅雷二三事	53
怀念丰子恺先生	62
元气淋漓的傅孟真	64
书饴天下才我为苍天哭	71
何莫学乎诗	75
忆六逸先生	81
我与弘一法师	83
敬悼许地山先生	85
新月旧拾	89
深夜怀友	92
记波外翁	93
有关西山逸士二三事	97
友 情	99
方令孺其人	102
关于老舍	104

悼念绀弩同志 109

我和雪峰 113

怀念胡风 115

怀念从文 122

痛悼傅雷 131

纪念傅雷 137

最完整的人格 139

自清先生二三事 145

活在人类的心里 146

平心二三事 147

追念夏丏尊先生 148

齐白石衰年变法 151

雁冰先生印象记 158

忆房东 161

悼念陈援庵先生 167

悼念顾颉刚先生 170

梁漱溟先生 174

悼志摩先生 175

我所认识的梁漱溟 177

怀傅雷 179

巴金和我们在一起 183

哀鲁彦 187

思念胡风和田间 190

谈交友 193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198

悼念温济泽同志 202

老来缅怀胡耀邦 206

推己及人 208

忆冼星海 210

记周培源先生 212

哭冯至先生 214

老 王 217

读《柯灵选集》 219

怀念老舍先生 221

我的四个朋友和老师 226

由石刻引起的交谊 230

忆韦素园

鲁迅

我也还有记忆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连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赏鉴家的眼目。

现在有几个朋友要纪念韦素园君，我也须说几句话。是的，我是有这义务的。我只好连身外的水也搅一下，看看泛起怎样的东西来。

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罢，我在北京大学做讲师，有一天，在教师预备室里遇见了一个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青年，这就是李霁野。我的认识素园，大约就是霁野介绍的罢，然而我忘记了那时的情景。现在留在记忆里的，是他已经坐在客店的一间小房子里计划出版了。

这一间小房子，就是未名社。

那时我正在编印两种小丛书，一种是《乌合丛书》，专收创作，一种是《未名丛刊》，专收翻译，都由北新书局出版。出版者和读者的不喜欢翻译书，那时和现在也并不两样，所以《未名丛刊》是特别冷落的。恰巧，素园他们愿意介绍外国文学到中国来，便和李小峰商量，要将《未名丛刊》移出，由几个同人自办，小峰一口答应了，于是这一种丛书便和北新书局脱离。稿子是我们自己的，另筹了一笔印费，就算开始。因这丛书的名目，连社名也就叫了“未名”——但并非“没有名目”的意思，是“还没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还未成丁”似的。

未名社的同人，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干就是素园。

于是他坐在一间破小屋子里，就是未名社里办事了，不过小半好像也因为他生着病，不能上学校去读书，因此便天然的轮着他守寨。

我最初的记忆是在这破寨里看见了素园，一个瘦小，精明，正经的青年，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在证明他穷着也还是钉住着文学。然而，我同时又有了一种坏印象，觉得和他是很难交往的，因为他笑影少。“笑影少”原是未名社同人的一种特色，不过素园显得最分明，一下子就能够令人感得。但到后来，我知道我的判断是错误的，和他也并不难于交往。他的不很笑，大约是因为年龄的不同，对我的一种特别态度罢，可惜我不能化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得到确证了。这真相，我想，霁野他们是知道的。

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误解之后，却同时又发现了一个他的致命伤：他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么？至少，在那时以至现在，可以是的。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

这里有一点小例子。——我们是只有小例子的。

那时候，因为段祺瑞总理和他的帮闲们的迫压，我已经逃到厦门，但北京的狐虎之威还正是无穷无尽。段派的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林素园，带兵接收学校去了，演过全副武行之后，还指留着的几个教员为“共产党”。这个名词，一向就给有些人以“办事”上的便利，而且这方法，也是一种老谱，本来并不希罕的。但素园却好像激烈起来了，从此以后，他给我的信上，有好一晌竟憎恶“素园”两字而不用，改称为“漱园”。同时社内也发生了冲突，高长虹从上海寄信来，说素园压下了向培良的稿子，叫我讲一句话。我一声也不响。于是在《狂飙》上骂起来了，先骂素园，后是我。素园在北京压下了培良的稿子，却由上海的高长虹来抱不平，要在厦门的我去下判断，我颇觉得是出色的滑稽，而且一个团体，虽是小小的文学团体罢，每当光景艰难时，内部是一定有人起来捣乱的，这也并不希罕。然而素园却很认真，他不但写信给我，叙述着详情，还作文登在杂志上剖白。在“天才”们的法庭上，别人剖白得清楚的么？——我不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想到他只是一个文人，又生着病，却这么拚命的对付着内忧外患，又怎么能够持久呢。自然，这仅仅是小忧患，但在认真而激烈的个人，却也相当的大的。

不久，未名社就被封，几个人还被捕。也许素园已经咯血，进了病院了罢，他不在内。但后来，被捕的释放，未名社也启封了，忽封忽启，忽捕忽放，我至今还不明白这是怎么的一个玩意。

我到广州，是第二年——1927年的秋初，仍旧陆续的接到他几封信，是在西山病院里，伏在枕头上写就的，因为医生不允许他起坐。他措辞更明显，思想也更清楚，更广大了，但也更使我担心他的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书，是布面装订的素园翻译的《外套》。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个寒噤：这明明是他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莫非他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么？

我不忍再翻阅这一本书，然而我没有法。

我因此记起，素园的一个好朋友也咯过血，一天竟对着素园咯起来，他慌张失措，用了爱和忧急的声音命令道：“你不许再吐了！”我那时却记起了伊孛生的《勃兰特》。他不是命令过去的人，从新起来，却并无这神力，只将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么？

我在空中看见了勃兰特和素园，但是我没有话。

1929年5月末，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园谈了天。他为了日光浴，皮肤被晒得很黑了，精神却并不萎顿。我们和几个朋友都很高兴。但我在高兴中，又时时夹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忽而想到他竟连介绍外国文学给中国的一点志愿，也怕难于达到；忽而想到他在这里静卧着，不知道他自以为是在等候痊愈，还是等候灭亡；忽

而想到他为什么要寄给我一本精装的《外套》?……

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

自然，这不过是小不幸，但在素园个人，是相当的大的。

1932年8月1日晨五时半，素园终于病歿在北平同仁医院里了，一切计画，一切希望，也同归于尽。我所抱憾的是因为避祸，烧去了他的信札，我只能将一本《外套》当作惟一的纪念，永远放在自己的身边。

自素园病歿之后，转眼已是两年了，这期间，对于他，文坛上并没有人开口。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杰，活的时候，既不过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后，当然也只好在默默中泯没。但对于我们，却是值得纪念的青年，因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未名社现在是几乎消灭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介绍了果戈理(N. Gogol)，陀思妥也夫斯基(F. Dostoevskiy)，安特列夫(L. Andreev)，介绍了望·蔼覃(F. vail. Eeden)，介绍了爱伦堡(I. Ehrenburg)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B. Lvov)的《四十一》。还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华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事实不为轻薄阴险小儿留情，曾几何年，他们就都已烟消火灭，然而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

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现在我以这几千字纪念我所熟识的素园，但愿还没有营私肥己的处所，此外也别无话说了。

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纪念的时候，倘止于这一次，那么，素园，从此别了！

1934年7月16之夜

忆刘半农君

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个题目。

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半农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难说得很。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子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她”字和“牛电”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

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所谓亲近，不过是多谈闲天，一多谈，就露出了缺点。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但他好像到处都这么的乱说，使有些“学者”皱眉。有时候，连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他很勇于写稿，但试去看旧报去，很有几期是没有他的。那些人们批评他的为人，是：浅。

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但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的，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

大半就为此。我最懒于通信，从此我们就疏远起来了。他回来时，我才知道他在外国抄古书，后来也要标点《何典》，我那时还以老朋友自居，在序文上说了几句老实话，事后，才知道半农颇不高兴了，“驷不及舌”，也没有法子。另外还有一回关于《语丝》的彼此心照的不快活，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回面，那时候，我们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了。

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我想，假如见面，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不给一个“今天天气……哈哈”完事，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

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后来有人通知我，半农是要来看我的，有谁恐吓了他一下，不敢来了，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到北平后，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

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追忆中山先生

蒋梦麟

我在此文中所要讲的，只是我与中山先生个人关系中的几件小事。

先生从事革命时，我还只是一个学生。虽然对于革命很有兴趣，但因学业关系，行动上并未参加。1908年(光绪末年)我到旧金山卜技利加州大学读书，那时先生时时路过旧金山，但直到1909年(宣统元年)某日，我才有机会与先生见面。见面地点是旧金山唐人区Stockton街一个小旅馆里，那一天晚上由一位朋友介绍去见先生。这位朋友就是湖北刘麻子，即朋友们都叫他麻哥的刘成禺(禺生)先生。我和他是加州大学同学，又同是旧金山《大同日报》的主编。《大同日报》是中山先生的机关报，因这关系，所以与先生很容易见面。麻哥为人很有趣，喜欢讲笑话。中山先生亦戏称其为麻哥而不名。中山先生虽不大说笑话，但极爱听笑话，每听笑话，常表示欣赏的态度。

第一次在Stockton街谒见先生，所谈多为中国情形，美国时事，若干有关学术方面的事情，详细已不能记忆。其余则为麻哥的笑话，故空气极轻松愉快。中山先生第一次给我的印象是意志坚强、识见远大、思想周密、记忆力好，对人则温厚和蔼，虽是第一次见面，使人觉得好像老朋友一样。大凡历史上伟大人物往往能令人一见如故，所以我与中山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很不正式的，很随便的。

此后，先生在旧金山时，因报纸关系，时时见面。武昌起义时，我尚在报馆撰文，刘亦在。而先生来，谓国内有消息，武昌起义了。闻讯大家都很高兴，约同去吃饭，一问大家都没钱，经理唐琼昌先生谓他有，遂同去报馆隔壁江南楼吃饭。谈得很多，亦极随便。大家偶然讲起《烧饼歌》事，中山先生谓刘基所撰一说是靠不住的，实洪秀全时人所造。又连带讲到刘伯温的故事。一次，明太祖对刘基说：“本来是沿途打劫，哪知道弄假成真。”刘谓此话讲不得；让我看看有没有人窃听，朝外面一看，只一小太监。问之，但以手指耳，复指其口，原来是个耳聋口哑的人。于是这小太监得免于死。大家听了大笑。

我讲这些话，不过要青年知道许多伟大人物不是不可亲近的，亦与我们一样极富人情味的。所谓“圣人不失赤子之心”，就是此意。

过了几天，先生动身经欧返国。临行时把一本 Robert's Parliamentary Law 交给我，要我与麻哥把它译出来，并说中国人开会发言，无秩序，无方法。这本书将来会有用的。我和刘没有能译，后来还是先生自己译出来的。这就是《民权初步》。原书我带到北平，到对日抗战时遗失了。先生时时不忘学术，经常手不释卷，所以他知识广博。自1909年至1911年期间与先生见面时，所讨论的多属学问方面的问题。

1917年至1919年期间，在沪与先生复经常见面。几乎每晚往马利南路孙公馆看先生及夫人。此时，先生正着手起草英文《实业计划》，并要大家帮他赶写。我邀同余日章先生帮先生撰写。每草一章，即由夫人用打字机打出。我与胡展堂、朱执信、廖仲恺、陈少白、戴季陶、张溥泉、居觉生、林子超、邹海滨诸先生，即于此时认识。

有一时期，季陶先生想到美国去读书，托我向先生请求。先生说：“老了，还读什么书。”我据实报告戴先生。戴先生就自己去向先生请求。先生说：“好，好，你去。”一面抽开屉斗，拿出一块银洋给季陶先生说：“这你拿去做学费吧。”季陶先生说：“先生给我开玩笑吧？”先生说：“不，你到虹口去看一次电影好了。”

先生平生不喜食肉，以蔬菜及鱼类为常食。一日席间，我笑语先生是 Fishtar 汹，先生笑谓以 Fishtarian 代替 Vegetarian，很对。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北大校长蔡子民先生离平南来，北大学生要他回去。他要我去代行校务。我于到平后不久，即收到先生一信。其中有句话，到现在还记得，那就是：“率领三千子弟，助我革命。”以后，我常住北平，唯有事南下，必晋谒先生。

北平导淮委员会绘有导淮详细地图。我知先生喜研工程，因设法一张带沪送予先生。先生一见即就地板上摊开，席图而坐，逐步逐段，仔细研究。该图以后即张挂于先生书房墙上。

杜威先生来华，我曾介绍去见先生，讨论知难行易问题。西方学者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们谈得很投机。杜威先生是个大哲学家，但亦是极富人情味的，有时讲一两句笑话，先生则有时讲一两句幽默风趣话。他俩的会见，给我的印象是极有趣味的。

1921年，太平洋会议在美举行。上海各界不放心北京政府。上海商会、教育会、全国商业联合会等各团体推我与余日章两人以国民代表身份前往参加。我因欲取得护法政府之同意，赴粤谒先生。先生欣然同意我等参加，并即电美华侨一致欢迎。那时北京政府想要妥协，是我们联合一批朋友共同反对阻止的。

1922年，于太平洋会议后取道欧洲返国。先到粤复命，并电告先生。至港，见郭复初先生乘轮来接，始知陈炯明叛变，先生避难舰上，无法晋谒，因由港返沪。

1924年，先生为求南北统一北上。余至天津张园谒见，告以段执政对善后会议无诚意。先生说：“那末我们要继续革命。”先生到平以后，一直卧病。我闻讯赶到，先生已不能言语了。1925年3月12日在北平铁狮子胡同顾少川先生宅逝世。

先生在北平协和医院卧病时，有中医陆仲安曾以黄芩医好胡适之先生病。有人推荐陆为先生医。先生说他是学西医的，他知道中医靠着经验也能把病医好，西医根据科学有时也会医不好，但西医之于科学如船之有罗盘，中医根据经验如船之不用罗盘，用罗盘的有时会到不了岸，不用罗盘的有时也会到岸，不过他还是相信罗盘。

以上所叙，是我个人所知道的关于先生的几件日常琐事。自旧金山小客栈开始，一直到先生在北逝世为止，所记都是小事，但从这许多小事里，或者可以反映当年一部分大事。

蔡子民先生与我

王云五

我认识蔡子民先生，始于民国元年一月下旬；但我开始听到他的大名则在临时大总统府成立后一二日。由于报纸刊载各部首长的名字，蔡先生被列为教育总长，其时我从事教育工作已有六七年，平素对于教育的制度备极关怀，因而对新政府的新教育首长，当然想略知其历史。不久我便探悉蔡先生是一位翰林，却具有革命思想，且曾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这时候我已由国父孙先生邀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正在清理手边未了的事，不日便要晋京任职，绝无另行求职之意。只是积久欲吐有关教育的意见，现在面对一位可以进言的主管部长，姑且尽我言责，至于能否发生影响，固所不计。于是我便抽出一些工夫，写了一件建议书。现在追忆起来，大约包括有下列各项建议：

(一)提高中等学校程度，废止各省所设的高等学堂，在大学附设一二年的预科，考选中等学校毕业生或相当程度者入学，预科毕业生升入本科。

(二)大学不限于国立，应准许私立。国立者不限于北平原设之一所，全国暂行分区各设一所。那时候我主张，除北平原有所谓京师大学堂外，南京、广州、汉口应尽先各设一所。

(三)各省得视需要，设专门学校，其修业年期较大学为短，注重实用。

按我国清末学制，各省设高等学堂一所，其大旨系仿日本的高等学校。惟日本所设的高等学校与大学有相当比例，程度也能衔接。故高等学校毕业生多能升入大学。我国各省份设高等学堂，其毕业人数断非设立京城唯一的国立大学所能容纳；且各省高等学堂虽相当于大学预科，然因程度不齐，多未能达成预科的作用。于是实际的作用，仅成为高等的普通学校。我认为不如将中学校程度提高，完成普通教育。其有志深造者，径行考升大学直接附设的预科。预科改由大学所附设，其程度自较易与大学本科衔接。不若各省高等学堂所造就者，大半不能升入大学，徒成为普通教育之额外提高，在教育的作用上不免等于一种浪费。因此，我一方面主张增设国立大学，并分区设立，以便升学；一方面主张准许设置私立大学，使那时已具基础之若干教会学校得于符合条件后升格为大学，以宏造就。至于为适应需要，并应准许各省设立专门学校，为期较大学为短，与清末的高等学堂和现在的专科学校相当，与大学分道扬镳，而改进当时高等学堂的空泛效用，使更合于实用。以上便是我对民国学制改进的建议大要。

我以一个未曾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居然提供许多关于高等教育的意见，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尝试。真想不到此一建议书，从上海邮寄到南京教育部以后，不过十天左右，我便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服务中接到由上海家里转来蔡先生的一封亲笔信。大意说对我所提供的意见认为极中肯，坚邀我来部“相助为理”。

我既承国父孙先生的厚意，在一席谈话之后，自动委以机要之职；现在又以尚未谋面，仅凭一纸意见书，又承蔡先生邀请相助为理。在鱼与熊掌之间，既不应见异思迁，又不愿放弃久怀改进教育而一旦获得可能实现的机会。幸而在不得已请示孙先生之际，承他老人家爱护有加，令我半日留府服务，半日前往教育部相助；于是我才敢持着蔡先生的手书，前往教育部面谒。想不到经此一度面谒之后，我对于蔡先生不仅做了半年左右的属员，而且缔结了三十年之深交。尤其是在抗战初期蔡先生因体弱不能跋涉远来后方，我因主持商务印书馆，不能不往返于后方与香港之间，初时同住商务印书馆的临时宿舍，继则时相过从。蔡先生视我如手足，我则视蔡先生如长兄。在蔡先生逝世时，我成为朋友中唯一的随侍病榻送终者。人生际遇真有不可思议之处。兹更就记忆，概述蔡先生与我三十年间的关系。

且说当时的教育部，草创伊始，还未曾订什么官制。记得在教育部服务的各人，都由蔡先生致送聘书，任为筹备员。工作上虽有差别，实际上也难免要分为主办的和协办的地位；却没有阶级高低的区分。所领津贴也一律为每月六十元。由于我只以半日来部办公，而且是同人中年纪最轻的(当时只有廿四岁)，当然不可能成为主办人员。那时候和我一起工作的有钟宪鬯(观光)、蒋竹庄(维乔)和汤爱理(中)诸君。钟君年事很高，曾在上海开办理化研习所，闻蔡先生一度加入听讲；蒋先生曾参加蔡先生主持的中国教育会；汤先生则系日本留学生，专攻法律。我们日常的工作，多半是讨论民国的新学制和课程；惟以临时大总

统孙先生下野，政府不久便北迁；在南京时代，一切规划还没有定义。

是年三月，唐少川(绍仪)先生受任为国务总理后，南京政府各机关开始北迁。蔡先生仍任教育部总长，我也随往北京任职。这时候，我奉派为专门司第一科科长，前清学部员外郎路壬甫(孝植)为第二科科长，英国留学硕士杨焕之(曾诒)为第三科科长。我们的司长林少旭(荣)是专攻法律的留日毕业生，原任学部参事，至与我在南京共同工作之钟蒋汤三君均任参事。北迁后的教育部次长是范静生(源濂)先生，原系学部郎中，我在长官和同事间，资历最浅，年纪也最轻。但由于蔡先生之赏识，我也能努力工作，对上对下与对同僚均甚融洽。据我的主管司长说，我以一个毫无行政经验的人，不仅处理公务有如老吏，对于公文的起草修正，也无不适合分际。在蔡先生留京任职的几个内，我的工作记得系以对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的起草，以及对京师大学堂的协助接收为主。上述两令实际上已把我在南京政府初成立时对蔡先生的建议三点完全采纳。至对于京师大学堂的接收事，系由我与第三科科长杨君会同办理。我以一个初出茅庐，且从未进入大学之门的青年，总算应付得宜，而会同办理之杨君却一切归功于我。因此，我在当时的教育部科长中，与普通教育司的许寿裳科长(后来迭任教育厅长，终于台省教育厅长任内)齐名。许先生是蔡先生的同乡后辈，我却是一个毫无关系的后进，同受蔡先生的拔擢。侧闻蔡先生常引以自慰。

但是好景不常，是年六月间唐内阁以责任内阁不能负责而辞职；蔡先生本来与唐少川先生毫无渊源，却坚请联带辞职。其风度与唐先生原对袁世凯总统有深切关系而不惜坚辞者，同为政治界之美谈。唐内阁辞职后，由陆徵祥继而组阁；蔡先生去职后，则由原任次长范静生先生继任，而以原任蔡先生秘书长董恂士(鸿祎)君为次长。初时一切萧规曹随，尚无何问题发生。后来由于专门司司长林少旭先生改任高等审判厅厅长；在他以法律专材从事司法工作，当然用得其长，但是问题便发生在他的继任人选。林先生一向和我相处得很好，尤其对我的能力与负责精神不断表示赞扬。在他要离开教育部时，私下曾对我有所表示，并言将力保我继任专门司司长，及至他的新任命发表，司中同人也一致认为我之继任，实为当然之事。想不到最后决定，却是以第二科路科长升任。路先生平时对我非常客气，骤膺此命形色上也表示万分不安。后来据林先生密告我，当他保举我继任之时，范总长好像落口答应，想不到经过几日后，范先生突然密告林先生，说以我的能力和负责精神，升任司长极适当，惟经详加考虑，以路先生资历极深，原任学部员外郎，与范先生仅次一级，一旦由资历较浅如我者擢升，难免不使路先生失望；好在我年事尚轻，来日方长，暂缓升任当无问题。范先生的抉择当然未可厚非。但我毕竟少不更事，乍闻新命，心里确不免有几分难过。幸而平素遇事尚能与他人易地设想，经过了一二日，也就释然。后来因为路司长侧重保守，司中同人富于积极精神的新进者颇多不满，甚至学部旧人，夙与路司长共事者间亦具有同感，遂使我处境甚感困惑，除极力遏抑自己情感外，还矫情转劝他人。可是矫情的结果，偶然不免落出不自然的状态。消息间接传到刚从德国回来的蔡先生耳朵，听说他曾转述意见，劝当局把我调任北京大学的预科学长。不知何故又有人从中阻挠，否则后来一段不

必要的纠纷，当可消除于无形。蔡先生爱我之深，更可于此见之。

范先生不久也去职，接任者由海军总长刘冠雄兼署。但刘总长毕竟对教育为外行，仅历月余也就请辞兼职，继而兼署者为农林总长陈振先。陈先生是留美农学专家，对于教育亦甚有兴趣；此次于二年三月，兼署教育总长原想实干一番。他虽是广东人，与我同乡，但因我是外江的广东人，对同乡人物认识不多，陈先生也素未谋面，因此，当他到部之初，并不知有我这一位同乡。可是我之被卷入漩涡，真想不到竟起于我平素不重视的乡谊关系啊。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江浙为文化最发达之区，教育界的杰出人物，往往不能舍江浙二省而他求，因此，教育部此时的高级职员中，包括次长和四位参事中的三位与三位司长中的两位，都是籍隶江浙两省。这并不因为蔡先生是浙江人之故。兼署总长陈先生独以广东人出任最高首长，如果能与各位高级幕僚随和，像湖南籍的范前总长一般，那就当然不会发生问题。可是陈先生毕竟有些抱负，而且习闻美国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关系，不免实行他的总长职权。初时为着发布一篇文告，吩咐原任的秘书人员起草，经办的秘书狙于故习，不免要商询主管司的意见。结果，对于总长的主张不免有重大的修正。陈先生以身为总长竟不能指挥一位秘书，实以农林部中并无适当人员可以调来相助，因向其某一小同乡（新会县籍）诉苦，他那位小同乡颇知我，力言近在教育部内的一位富有经验与能力的同乡何以不加利用。陈先生听了这段话，次日一早到部，便约见我详谈，既略知我的抱负，遂将其意欲分布的文告嘱我起草。我便在他的办公室内，花了不满两小时，写成二三千言的文告，送给陈先生核阅，他感到十分满意，因即表示要我以专门司第一科科长之职调兼总长的主任秘书。我认为既承赏识，自不难有发展抱负的机会，略不谦辞。以此兼职，我遂得出席部务会议。彼时的部务会议，系以部次长参事司长及主任秘书构成。主任秘书也具有相当重要性。

在参加的最初几次部务会议中，由于陈先生对各项议案不甚熟知其经过者，辄先征询我的意见。我因对部务大都熟悉，间有不甚了然者，必先调查档案，或向主管单位详询经过，于是多能对陈先生提供适当的意见，所以会议进行尚属顺利。后来却发生一项有关政治的问题。查那时候的国会议员被选资格中包括有中央学会会员一项特殊资格。由于原规定颇为含糊，致有相当于专门学校的许多杂牌学校毕业生纷纷比附要求；从宽从严，应由教育部决定。在讨论此一问题的部务会议中，除社会教育司夏司长曾佑无意见外，其他参事三人（原额四人中有一人外调）与普通专门两司司长意见一致，却与陈兼总长的主张相左。陈先生不肯屈服于多数之幕僚，而五位高级幕僚一致反对总长，致酿成僵持之局。那时候我国的公务员服务法虽还没有颁定，但是幕僚对于长官的主张虽得陈述相反的意见，惟一经长官决定，幕僚便应服从，绝不能以属员的多数团结对抗长官，此为世界一般政治的通则。因此，我不得不维护行政上的原则，力劝各参事司长，在已尽其言责之后不宜过分坚持。想不到因此竟触众怒，认为我袒护同乡的长官。最后，全体参事司长除社会教育司长夏先生外，一致对陈总长以集体辞职为要挟。陈总长不为所动，皆予照准，除派我暂兼专

门司司长外，并派杨科长曾诒及彭视学等正兼署参事。董次长为表示对于辞职参司五人之同情，亦请病假不到部。陈先生初时态度坚决，不予置理。我对这几位辞职的参事司长，虽多从南京时代开始共事，平素感情也还融洽，可是为着政治上的原则，不得不支持陈总长，以免恶例一开，将来政务官不能发生其对政治的作用，转为僚属集体把持，无异太阿倒持。如果陈先生能够坚持到底，此一原则或可确立不移。可惜得很，陈先生不知受到外间什么压力，突然请辞兼署教育总长之职，改由请假中之董次长暂代部务，不久又由汪大燮来长教部，于是已辞职照准之各位参事司长，大都复职或转职，杨曾诒、彭守正二君也各回任本职，我只好出于辞职之一道了。此一事件发生后在人情上我似乎有些对不起几位从南京开始共事的朋友，尤以多系蔡先生所用之人。然而在公事上我是问心无愧的。后来蔡先生听到此事，却未尝对我有何不满。二十年后，当我和蔡先生时相把晤之时，偶然谈起此事，我颇咎自己当时的少年气盛。但蔡先生认为我的主张绝对正确，并力言在处理公务之时，断不可顾及私情。

民国十年我开始担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所长。蔡先生也已从国外倦游归来。由于商务印书馆和我均与蔡先生有旧关系，对于编辑和校阅之任务常向蔡先生请求指教或相助。前任编译所所长而现任该馆监理之张菊生先生和蔡先生为科举同年，对蔡先生的称谓常用其旧日的别号“鹤卿”，于是我也逐渐从“子民”先生改称为鹤卿先生，倍益亲切。我对于商务印书馆编译出版方面有所创作，事前辄向蔡先生请教，个人遇有作述，亦几乎无不请蔡先生指正。蔡先生对于我有所举措无不鼓励有加，例如民国十四五年间，我从事于检字法之研究，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蔡先生首先为我作序，其末有如下之一段：

中国人创设这一类方法的，我所知道，自林玉堂先生五母笔、二十八子笔始，林先生的草案虽五六年前曾演给我看；然而他那具体的排列法。至今还没有发表；我还不能亲自演习，究竟便利到何等程度，我还不敢下为断语。最近见到的，就是王云五先生这种四角号码检字法了。他变通永字八法的旧式而归纳笔划为十种；仿照平上去入四音的圈发法，而以四角的笔划为准标；又仍以电报号码的形式，以十数代表十笔，而以。兼代(表)无有笔划之角。这种钩心斗角的组织，真是巧妙极了。而最难得的是与他自己预定的原则，都能丝丝入扣，王先生独任其劳，而给(我们>人人有永逸的实[享]用，我们应如何感谢呢？

又民国十七年当我创作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向蔡先生请教时，他也自动为我作序，有片言道破内容的下列两段文字：

(一)王云五先生博览深思，认为杜威的分类法，比较地适用于中国；而又加以扩充，创出新的号码，如“十”“廿”“士”之类，多方活用。换句话说，这一方面维持杜威的原有号码，豪不裁减；一方面添出新创的类号来补充前人的缺点。这样一来，分类统一的困难，便可以完全消除了。

(二)著者姓名，中文用偏旁，西文用字母，绝对不能合在一列。若是把中文译成西文，或把西文翻成中文，一定生许多纷歧。其他如卡特所编的姓氏表，于每个姓氏给以一个号码，也是烦杂而无意义。要一种统一而又有意义可寻的方法，莫如采用公共的符号，可以兼摄两方的。这种公共的符号，又被云五先

民国十六年，我开始筹备万有文库初集的编印。其中对于书目的拟订，煞费思量，并欲借此以一个具体而微的图书馆，以低廉的价格和最便利的方法，供应于读书界。此一措施极承蔡先生鼓励。对于书目的决定，亦迭承指正。关于著译的人选亦多承推荐。蔡先生的学生知好极多，自动恳求蔡先生向我介绍书稿，或推荐职业者，蔡先生大都是来者不拒，而且每一次都是亲笔作简单的介绍。但他亲自对我说，他的介绍目的，只是让我知道其书稿或其人的来源，由我自行注意；因为他绝对没有工夫把每一书稿都读过，或把每一个的服务能力考验过，才写信介绍，因为这是各有专长的事，一部书稿到了我们的编译所也是分交有关的专家审查；一个人被推荐后，也应经过考验。所以他的介绍书，只是使我注意其来历而已。至有特别推介之必要者，蔡先生的信定然写得较为具体而详尽。我领会此意，所以对于蔡先生的一般推介函，多不另作详尽的考虑，这一点可能是我与蔡先生性情不同的地方。我因为从事出版事业多年，遇事注重实际，对于介绍函绝少书写，尤其是习惯成了自然，一旦破例，辄易使人误会为真正的推介。蔡先生毕生度着学者的生活，同时富于中国的人情味，多年以来对于推介之请求既然是来者不拒，一旦予人以峻拒，定然使受者万分难堪。因此，到了晚年他还是保持此种多年习惯。这完全是由于处境不同。我之尊重蔡先生的习惯，正如我自己保持自己的习惯一般。

民国十八年，我在商务印书馆任职已满一年。在编译所方面，应付二三百位的读书人还不感任何困难，而负担艰巨工作，特别是多至二千册的第一集万有文库也已顺利出版。假使我继续下去，对于原有的任务尚解问题。问题却发生在与我本无直接关系的任务。自从民国十五年以来，上海的劳资纠纷迭起，商务印书馆的工会是在企业界中最具势力者之一。纠纷之起当然以印刷所为主，发行所及总务处次之；编译所间有少数人活跃，大多数皆为新旧学者，态度稳健。因此，工潮的发生，如果不是由印刷所长从事局部的应付，便应由总经理协理与人事科长作全盘的应付，在理是不应轮到我头上的。但因那时候的总经理为印刷所长鲍先生所兼任，他年事已高，且平素笃实不善言辞，其他经协理等亦多属于这一类型。因此某一次工潮闹大了，使我不能不挺身而出，结果应付尚属得当，一场风波随而平息。此后一遇劳资纠纷，资方都一致推我出马交涉，竟使不应负责的我，转而负了全面的责任。这些消极的事，偶尔担负尚无可，若渐渐变成家常便饭，那就对于一位需用脑力以应付出版计划和学术研究的人，未免是近乎残酷了。因此之故，我对于商务印书馆的任务，原具有最高兴趣者，其兴趣便逐渐随工潮之继涨增高而低落。于是决心摆脱，并先设法物色替人。适数年前为编译所聘得何柏臣(炳松)君为史地部部长，经年来的注意观察，认为尚适于继我之任。于是开始作辞职的打算。适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先生担任院长，并罗致我的一位旧学生杨杏佛(铨)为总干事，杏佛又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我偶与杏佛谈及脱离商务印书馆之决心，杏佛初时力劝不可，经我详加剖析，卒亦赞同。因言社会科学研究所新成立，他以总干事兼任，原系暂局，设我辞商务职获准，愿举贤自代。一如八年前胡适之君举我代任商